

青少年問題預防工作的挑戰

翁毓秀譯

壹、導論

由於亞洲的青少年人口佔亞洲人口的大部分，因此，青少年工作正面臨一大挑戰。亞洲也是世界上發展最快的。青少年不但世界經濟復甦的潛在貢獻者，而且在社會和政治上也是重要的前導。

青少年問題可能是代價相當高的——它不但需著重於問題情況的立即性補救工作，而且長期而言，將會中斷和喪失生產量。因此，古諺：「預防重於治療」用於目前青少年問題的處遇策略上是十分有意義的。及早的介入協助危險的青少年使其成為負責任的和具生產力的成人，而不致成爲一種負擔

(McWhirter et al, 1993)。

這篇文章討論了青少年預防工作的挑戰，了解處遇中邊緣的概念和預防介入的途徑與範圍。

貳、青少年預防工作的挑戰

都市青少年預防工作的挑戰包括了解想要預防的問題，對於介入預防的人口定義出基準比率和評估介入是否成功。

一、預防什麼？

在我們討論預防之前，我們需先澄清我

們需要預防什麼問題的發生。

一般而言，青少年的預防方案，多半是處理犯罪和違法事件，藥物和酒精濫用，未婚懷孕，墮胎，和其他社會問題。

違法是特指對兒童而言是不合法的行為，而曠職、無法改變的惡習和行為對成人而言是可以接受的，但對兒童是不容許的，例如，抽煙、喝酒、性活動、上酒吧或是和人賭博等。

對許多需要預防的問題，目標可能不是青少年而是他們的家庭，教育機構，醫療機構及司法體系。

二、基準率和標的問題

預防工作的第一個挑戰是需要定義危險中的青少年標的團體。

在定義青少年危險群時常會是模糊不清的。一般的定義指的是可能會有問題的青少年或是涉入問題初期的青少年 (McWhirter, 1993)。但是我們的臨界點應在哪裡？如何可以稱為是虞犯 (Pre-delinquents) 呢？這是一個基準率的問題，也就是說，當我們使用一個診斷設計來計算出某一個問題發生的可能性 (Cheng, 1995)。問題是那些診斷標準我們需用來判斷是不是危險的青少年？是成績低落的學生或是那些已經離開學校的或是在購物中心閒蕩的學生？我們又如何去定義那些價值、態度和行為是危險的？(Tidwell and Garrett, 1984)。如果我們的定義太寬了，那麼有些被誤認的青少年可能會和真正處於危險中的青少年一樣接受治療。這不僅是個效率的問題，也是個倫理問題。

另一個在面對青少年人口的問題是確定的危險人數並不存在。最可以使用的數字是從學校中輟的學生，而且沒有工作的。另外

一類就是無家可歸的。如果青少年既不在家又不在學校又沒有受雇，這些青少年就是無所事事的。我們能不能說這些無所事事的青少年就比其他任何青少年群更處於危險的狀況呢？

三、成效評估

青少年危險人口定義上的概念難題，加上模糊不清的處遇，使得預防方案的成效測量十分困難。當然，定義「成功」，有其評估上的基本難題。問題未出現或是降低的記錄就視為是「成功」呢？評估的方法之一是以單一個案研究設計，先決定其起點時的基本狀況，再監控在處遇過程中的進展及處遇完成時的評估。個案研究的方式在這種情況下是有用的。

處遇的成功就有賴指認出可能的問題青少年，並提供適當的處遇。如果這名青少年結果相當好，也可能即使不提供處遇他也不會變壞或者他真是一個虞犯而被拯救了。

參、邊緣的概念

我們運用邊緣的概念來了解危險的青少年，是那些青少年在聯合國的文獻中 (UNEC, 1988)，邊緣被描述為一種「結構狀況，而不僅顯示一特殊個人的心理狀況而已」。

邊緣青少年常常被描述為「沒有歸屬的」，「分離的」，「孤立的」或「不守規則的」青少年。邊緣表示在某一社會中存在的一種狀況，但並不完全是該社會中的一部分。青少年的「雙重矛盾」，同時在次文化及主流社會中追求互斥的目標而產生緊張狀態。例如，物質主義，就如穿名牌服飾受讚賞；耍酷和到處遊蕩而不去上學或工作也是一種風尚。當青年人無法得到他們所想要的時候將產生衝突。

在青少年的發展過程裡，很自然的會經歷同儕及家長以外的重要他人影響力的增加。這些青少年並不是正式組織成的，而是自然形成的。青少年並未正式進入主流社會，因為他們既不是兒童也不是成人。他們是不准投票、不准抽煙、不准喝酒和不准看限制級的成人電影的。

如果青少年不歸屬於學校或職業機構等教育體系，那這些青少年就可能是處於邊緣的位置。這些青少年中部分會試試就業市場。Ngiam (1974:14) 稱青少年無法獲得與他們的教育水準和經驗相稱的正規工作是青少年邊緣狀況的特徵之一。青少年參與社會的努力遭遇到失敗和拒絕。持續的拒絕將青少年推向退縮的狀況，並且被社會機構剝奪了權利。

當我們處理邊緣狀態時，我們需要考慮造成邊緣的因素。常常關心青少年在社會中的地位，和經由了解他們的發展任務來接納他們，青少年問題的預防需要結合整合理論。整合理論著重於積極發展青少年對家庭、社區和國家的貢獻。

肆、服務的方式和範圍

運用區位學的观点 (Germain, 1979; Germain & Gitterman, 1980)，危險青少年的處遇需包括兩個方向：

1. 使青少年能夠較有效率地迎合社會期望和需求。

2. 協助社會系統調節和改變以適應這些青少年。

第一個方向可以被歸為直接處遇，而第二個方向則可以歸為間接處遇。

一、直接處遇

直接處遇著重於促進青少年適應和順應社會。

這些服務可以從街頭的外展工作到鄰里的暫時居留中心。這種處遇的過程是經過，先做朋友、招募起來、選出委員、使具社會性，然後宣傳的模式。有各式各樣的活動，但通常是社交性、教育性或是休閒性的方案。這些方案包括了具有督導的課前與課後服務，學費服務，玩具和書籍圖書館，遊戲團體和活動等。這些方案多著重於正向價值的教誨。有些機構甚至提供熱線服務、諮商和家庭服務，這些機構的方案可能包括社交技巧訓練，以家庭為中心的活動，父母支持團體，提供資訊和轉介至其他社區資源的服務。

務。

計畫這些活動的指導原則是，「青少年對什麼有興趣？」一般而言，青少年喜歡和青少年在一起，他們並不那麼在乎這些方案做什麼。

負責的機構可能是鄰里社會服務中心。在服務中心裡有青少年俱樂部，具有社交的和休閒設施的社區中心和青少年方案，或兒童警察俱樂部。例如，兒童警察俱樂部由招募邊緣青少年加入他們的方案，對於虞犯青少年具備了預防的角色功能。

專業人士的參與可以由參與管理委員會、志願服務者、到受過專業訓練的外展工作者和青少年工作者。愈來愈多的志願工作者來從事外展方案，不僅在人力資源上是一個良好的指標而且能增進民衆參與社區事務。運用合適的、受過訓練的青少年從事直接外展工作更是值得稱許的。

二、間接處遇

若街頭工作是直接處遇，社區工作就是間接處遇了。假若社區顯出較大的社會失功

能的狀況時，這些可能受害的鄰里就成為重要的研究和處遇目標。結合問題解決和社區發展之草根領袖是重要的預防處遇策略。預防的重點是發展原有助人關係的自然網絡。

間接處遇是有系統的方向定位和引導社會機構達到改變的目標。引導教育機構，例如：學校，技術和職業學院等，提供補救性方案給適應困難的學生。這些技術性的和商業技巧的繼續教育和訓練對適應不良的學生是有需要的。最終的結果是儘可能的讓青少年留在學校裡而且能發展和發揮他們最大的能力和潛能。當他們離開學校或商業學院後能夠有效率的進入就業市場。同時，需要更加重視青少年的休閒方案和健康的活動場所使青少年能夠從事有建設性的娛樂。

在預防策略中，司法體系和志願性的福利組織，學校，鄰里和社區團體之間需要有更多的協調。目的是要使機構能特殊化，減少孤立，建立社區資源和提供助人過程的中心點。

Cheng (1995) 和其他學者 (Levine and Perl Lins, 1987) 曾說：「從限制的觀

點而言，一個以高危險者為取向的處遇，其解決社會系統和大環境中的問題之處遇策略不但是需要的而且是重要的。」從間接策略而言，通常是需要社會來提供結構上的供給以順應青少年的需求。這樣的取向建議針對主流的青少年提供機會。

其他的預防努力需集中於大眾傳播，工業界，行政政策或立法，如此才能改變造成青少年問題的社會情境。

伍、結 論

除了直接和間接處遇，另外有一學派提倡激進的不處遇。Schur (1973) 提倡社會應順應最大可能的差異性。例如，社會不強迫犯罪者或違規者去適應，社會應該接受他們而且不去理會他們。我們相信我們應該接納他們，但是並不是無動於衷的，而是需要積極處遇的。至於我們應該處遇多少和我們應該以那一個團體為目標則是需要智慧來決定。

預防的方式必需是與問題解決合作的方式。

式。青少年工作者並不是一個獨奏者，而是一個政府團體和非政府團體的資源牽引者。這些團體包括，例如，學校，宗教團體，以種族為基礎的自助組織，雇主和司法人員等。青少年工作者必須與這些資源共同解決問題。

發展性處遇與補救性處遇間的界限是很小的。預防性處遇的方式處理問題發生之前的部分。這樣的預防措施能減少問題發生後的處理困難。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去和何時去做這些預防措施。

[本文譯自 Tan Ngoh Tiong 所撰 The Challenge to Preventive Youth Work... 原文出自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Social Work, Volume 5, Number 2, July 1995.]
(本文作者現任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教授)